

(三)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精神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多元入學、發展多元智慧、打破明星校系迷思、建立學校特色、擴增學生多層面的學習、邁向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以及培養學生探索興趣，規劃生涯能力。多元入學方案的規劃精神如下（徐明珠，2003；莊珮真，2002）：

1. 多元智慧：藉由多元入學方案，促使教學正常化，發展學生多元性向。
2. 多元選擇：各校自行選擇多元招生方式，學生主動選擇入學方式。
3. 多元特色：藉由多元入學方案，促使大學校系發展特色。

第二節 家庭背景與城鄉差距

西方社會教育機會均等所面臨的問題有種族、地區、性別、社會階級的差異、教育過程中的歧視、文化貧乏的不利影響。在我國方面，以社會階級和地域間的差距最為嚴重（林清江，1990；楊瑩，1995）。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家庭結構中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親職業、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居住地區、家庭大小）被視為與社會流動、入學機會較為有關；而家庭過程（父母管教方式、教育態度與期望水準）及家庭文化（家庭觀念、態度、語言及行為等）則與學業關係密切；而教育機會幾乎是利富、利高職業、利高階層的（郭明堂、羅瑞玉，1995）。

值此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際，學生的家庭背景是否影響入學機會的

分配，值得進一步探討。同時，有關教育發展的公平性，城鄉差距的問題，是近十年學者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亦指出，我國在城鄉教育發展的均衡性上仍存在相當的差異；所謂城鄉差異係指交通較便捷、經濟較富裕及文化刺激較多的城市地區，與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較貧瘠落後的鄉村地區之間的教育發展差距（郭明堂、羅瑞玉，1995）。此外，城鄉差距尚包括民間人口教育程度、所得分配的差異等。上述的城鄉差異問題，是否影響多元入學方案施行下入學機會的分配，同樣值得進一步探究。以下就家庭背景與城鄉差距等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一、家庭背景

Trow (1974) 在 OECD 的高等教育研討會上提出將高等教育的發展分為：菁英型 (elite)、大眾型 (mass)、普及型 (universal)。菁英型的大學提供的就學率是 1%-15%；大眾型的大學可提供 16%-50% 的就學率；普及型的大學已發展到提供 50% 以上的就學率（楊思偉，2000）。如果按此標準，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已經步入普及型。換言之，隨著大學校院數目激增，我國高等教育淨在學率跟著倍增，18 到 21 歲人口的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已超過 42.5%，遠超出十年前的 23.47%。我國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已超過走菁英教育路線的歐洲國家，和走普及教育的美、加等英語系國家相當（聯合報，2002）。綜上所述可知，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正朝普及型發展，而此高等教育的擴張，對高中畢業學生入學機會會有所影響。但是否促進教育機會更為均等，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從過去國內相關的實徵研究發現：(1) 家庭背景愈佳者，學生學業成就愈高；(2) 家庭社經背景會影響學生升學意願；(3) 家庭背景會影響學生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機會；以及(4) 教育機會的分配隨者教育擴張而有明顯改善，代間向上流動的比例增加(楊瑩，1997)。進一步的研究指出：(1) 高所得家庭子女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機會，比低所得家庭子女要高；(2) 公立大專院校學生的家庭背景，無論是在家庭所得、家長教育程度與職業，都優於私立大專院校學生的家庭；(3) 家長教育程度較高、職業類別較佳、家庭收入較多者，其子女錄取大學的比例較高，反之則較低；(4) 高等教育階段，大專院校學生背景明顯優於三專學生與二專學生；(5) 隨著教育擴張，不同階級子女受教機會均有增加之趨勢，教育擴張初期，最早獲益者是高社經背景家庭的子女，到了教育擴張後期，低社經背景者受教機會才有明顯改善(陳聽安，1981；楊瑩，1994；楊瑩，1997)。駱明慶(2001)在其「教育成就的省即與性別」的研究指出，父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上大學機率有顯著正面的影響，父親為大學畢業者比父親為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上大學的機率高16.88%，母親為大學畢業的影響則為16.53%，父母教育程度解釋了大部分省籍間的教育程度的差異；相對於居住地為鄉村地區，居住於台北市、都市或城鎮均有較高的機會上大學，其中以居住於台北市的效果最強，達5.71%，居住於台北市以外的都市地區也較居住於鄉村地區上大學的機率高4.68；而父親於公部門工作者增加1.77個百分點就讀大學的機率。文獻亦指出，教育具有等化的功能並降低階級複製的機會，而台灣當前教改重點，不

是教育的擴充與延伸，而是教育的公平與正義。而階級複製的現象在資訊社會衝擊下更為明顯。例如現在的多元入學管道，不論是甄試或申請入學，擁有資訊即增加勝出的可能，若家長教育程度不高，可能居於劣勢。更重要的是申請學校時，家庭背景具有關鍵性，到最後一關口試時，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再度抬頭。從客觀的統計數字來看，例如台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並不完全是他們懂得努力或是具有較高的天份，而是他們的家庭背景平均明顯優於同齡者家庭(薛承泰，2003)。

而國外的研究發現亦指出各階層間就讀高等教育的差異仍然很大。以美國而言，高等教育有明顯階層化的現象，即社區學院學生的家庭背景最低。其後依序為公立學院、公立大學、私立大學(符碧真，2000)。

根據社經地位指標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高社經家庭背景的學生，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率是低社經家庭背景學生的 2.5 倍；而能夠進入四年制大學就讀的機率是低社經家庭背景學生的 4 倍；另外，高社經家庭背景的學生，其能完成大學教育的機率是低社經家庭背景學生的 6 倍 (Sewell & Hauser, 1972；符碧真，2000)。以英國而論，處於高社會地位的專業及管理性工作者，其子女能進入學術聲望卓著大學的機會是無技術及半技術工作者子女的 8 倍 (Halsey, Heath, & Ridge, 1980)。

此外，國外研究亦發現，各階級間就讀高等教育之差異未隨時間改變而有明顯變化；英國與荷蘭的研究結果均不支持各階層間入學機會差距漸漸縮小的論點，雖然低階層子弟入學機會增加超過一倍以上，最高階層子弟的入

學機會只增加二分之一倍，但階級間實際數值的差距卻是隨著時間而擴大，教育擴張新增的大學生仍然是出身於高階層者，只有非常少數是來自低階層（符碧真，2000）。

根據美國 1999 年有關學生父母親學歷的調查指出，大學生註冊率會因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明顯差異。百分之八十二的學生其父母親擁有大學學歷或更高學歷者，會在高中畢業之後立即就讀大學；父母親擁有高中而沒有大學學歷者，54% 的學生會在高中畢業之後立即就讀大學；父母親沒有完成高中學歷者，只有 36% 的學生會在高中畢業之後立即就讀大學。與擁有大學學歷父母親的同儕相比較，非大學畢業家長的子女多半是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人以及低收入的家庭（Choy, 2001）。顯然地，由 Choy 的研究可知，高中畢業學生就讀大學的比率，受到父母親教育程度的影響很大。換言之，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註冊就讀大學的比率也愈高；而低收入家庭是阻礙子女就讀大學的主要影響因素。

Teachman (1987) 的研究指出，父母親提供了人力和物質資源來增進及發展孩子的學業和能力，父母親若是有較高的學歷和收入，就很有可能有較好的能力和動機，來提供孩子有更多且較好的教育資源，進而提高孩子的教育成就。然而，這些資源應該只是單純與家庭背景的有效資源有相關。例如 Sui-Chu & Willms 在 1996 的研究中發現，高社經背景的家長參與學生教育的比率，會高於低社經背景的家長。因為家長有較多的參與，可以培養對學校有正向的態度；也可以改善學生的讀書習慣以及降低缺席和輟學的比率；

亦可以提昇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生的學業成就和家長社經地位的關聯性，會因家長對學校相關活動不同的參與程度，而有所不同。因此，要增進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必須增進學校教育的績效，以及降低學生因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所造成的不公平。因此，父母親提供的教育資源應該會直接影響到學校教育與學生的學業成就。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對於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源之提供就越充足，越有利於學生學習，對子女接受大學教育機會，也有明顯的影響；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其能夠提供子女的教育資源不足，因而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表現與受教機會(Useem, 1992; Krymkowski, 1998; Wong & Sin, 1998; Zhou, Moen & Tuma, 1998)。

研究顯示，在 1980 到 1984 年之間，黑人在大學入學的比例下降至 14%，主要的因素乃是大學學費增加有關。其中有兩個因素影響黑人入學比例：學費的增加和家長教育背景。低社經背景的白人家庭，其孩子在大學的入學比例上也與黑人家庭孩子的大學入學比例相近；此外研究也顯示高社經背景的家庭，其子女大學入學上有較高的比例 (Kane, 1994)。換言之，學費的上漲與各世代父親教育程度的變化，是影響教育成就變動的的重要因素。同時，學生教育的取得與父母的教育程度有相關。黑人家庭中若是父母皆為大學畢業其子女繼續升學的比例為 85%，因此，父母的教育程度的確影響學生入學機會 (Mare, 1980; Manski and Wise 1983; Taubman 1989; 引自 Kane, 1994)。

根據一篇針對台灣的教育調查顯示，在研究變項當中（父親的職業階級、母親的教育程度、父親的教育程度、父母親的族群背景、工業化程度、性別），父親的教育程度是預測子女教育取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的重要因素（Tsai & Chiu, 1993）。

Chiswick（1988）研究指出，影響子女教育取得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的多寡、家庭收入的多寡以及較少的子女數。換言之，具備高社經背景的父母，其子女有較高的入學比例。而

Haveman 與 Wolfe（1995）的研究指出，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的高低是決定子女能否進入較高品質學校的依據。

另外，在日本進行影響大學入學機會的研究中發現，學校聲望、父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是對學生學業成就有影響的（Stevenson & Baker, 1992）。波蘭社會學家也指出，隨著不平等的教育機會擴張，應對低社經地位的社群，擴大其教育機會，以降低社經背景和受教機會間的相關性（Gerber & Hout, 1995）。

上述相關研究顯示，家庭背景對個人受教機會有相當影響力；然而以台灣的發展狀況，隨著目前教育的擴張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高中畢業學生入學機會的分配是否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這是本研究亟待探究的重點之一。

二、城鄉差距

如前所述，城鄉差異係指交通便捷、經濟富裕及文化刺激較多的城市地

區，與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較貧瘠落後的鄉村地區之間的教育發展之差距。研究指出，學生的家庭背景會因其家庭居住城、鄉之別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家庭居住地區為院轄市及省轄市等都市地區，其家庭背景有較家庭居住於其他縣市（鄉村）為佳之趨勢（楊瑩，1994）。駱明慶（2002）研究發現指出，1982年至2000年台大學生有82%是來自於二十個明星高中，其中北一女應屆畢業生有將近一半可以進入台大，其中有一半台大學生是住在大台北地區，而台北市進入台大的機率最高，約為台東縣的十五倍，而大安區更是勇奪全市；而台大畢業生來自明星高中的情形，主要集中於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和台南市等都會區，其他縣市的高中僅佔台大學生的極小部分。而各縣市18歲人口考上台大機率的差異，一方面各縣市差異很大，另一方面此差異不但沒有縮小的趨勢，台北市的優勢似乎日益擴大。由上述研究可知，城鄉之間在升學方面是有顯明的差距。由上可知，家庭背景與居住地（城與鄉）有著相關性存在，但是否意謂著城鄉差距對於高等教育就學機會具有解釋力呢？在其大學入學考試者與錄取者家庭社經背景之分布情形的研究指出，父親的教育程度較高者、從事非手工的職業者、居住院、省轄市、兄妹在四人以下、以及家庭收入較高者，其子女被錄取的機會也較高。上述研究發現，居住院、省轄市者，錄取大學的機率較高（黃昆輝，1978）。然而，歷經二十餘年之後，居住地（城與鄉）是否仍然影響大學入學機會，值得進一步關注。城鄉差距除了地域上的差別外，其他層面（例如經濟、民間人口教育程度、所得分配）的差異，是否影響入學機會的分配，有待進一步證實。從現有的

資料顯示，城鄉在上述層面，確實存有差異存在。就縣市別觀之，依 2003 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顯示，台灣地區各縣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教育程度仍以工商業較繁榮之台北市、台中市等教育程度較高，而以東部縣市平均教育程度較低；90 年台灣地區大專以上人口比率 24.5%，較 80 年提高 9.7 個百分點，其中台北市及台中市分為 44.8% 及 36.1%，各增 16.1 及 15.8 個百分點，其餘各縣市亦均呈提升趨勢。所得分配的差距近年來有擴大的趨勢，按行政院主計處的公佈的資訊，2000 年台灣所得分配的差距為 5.55 倍，2001 年台灣所得分配的差距為 6.39 倍（行政院主計處，2003）。2001 年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報告指出，近年來產業景氣兩極化，高科技產業薪資扶搖直上，國人所得在 1999 年名列前 10% 的高所得者，平均每人「已分配要素所得」近 133 萬，是最後 10% 的最低所得者的 42.17 倍。兩年前這樣的高低所得組相差只有 23.7 倍（經濟日報，2001, 4, 13）。當教育愈來愈普及，進入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台灣所得分配的差距反而擴大，而此擴大現象是否影響入學機會的分配，值得持續觀察與深入探究。

第三節 教育機會均等

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理想，一直是世界各國長期追求的目標。教育機會均等的前提是入學機會的均等，在消極方面，不因性別、宗教、種族、家庭背景等因素，限制其入學機會；積極方面，應協助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彌補缺陷的機會，使能發揮其潛能。Warnock(1975)